

## 地域視野下的澳門歷史文化研究

鄭德華

**提 要：**本文以地域文化主要由物質與非物質、制度和精神文化構成，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地域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力作為研究的框架，探索澳門港崛起的自然地理因素與社會歷史因素，分析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現實價值，提出澳門歷史文化形成、發展的正反面啓示。

**關鍵詞：**地域文化；澳門港；澳門歷史文化

### 前言

近十多年來，澳門研究有一個長足的發展，無論是在政治、社會、經濟、歷史和文化方面的研究，都有非常可喜的成績。目前澳門研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推動研究的深化。本文擬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就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幾個方面提出一些看法，目的是在現有不同領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用地域文化研究的方法作為導入途徑，試圖把這些成果作進一步的補充、整理和深化，使我們對澳門歷史的發展有更深的認識。

首先，本文要說明的是，澳門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看，它完全具備了自己的文化特色。<sup>①</sup>雖然，它在歷史上曾經隸屬南海郡番禺縣（秦）、東官郡（晉）、寶安縣（隋）和東莞縣（唐），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設香山縣，澳門從此納入香山縣範圍，地屬恭常都。但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前，澳門基本上是漁民和從事海上商業運輸的暫居地，並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地域文

<sup>①</sup> 本文認為，一個地域文化必須有一定的時空概念，必須形成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文化。這種文化是指該地區物質、制度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總和。

化。1557年，葡萄牙人用借地晾曬貨物為理由入據澳門，從此開始了澳門歷史的另一階段。儘管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在入據之後不斷擴展自己的勢力，並以歐洲自治體制的概念建立起議事會制度，<sup>②</sup>但應指出的是在鴉片戰爭以前，澳門一直是由中國香山縣具體管轄，駐澳葡萄牙人要向中國政府交租。澳門是在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後，葡萄牙人才獲得“永駐管理”權。<sup>③</sup>可以說，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近500年的社會歷史發展營造了獨特的澳門文化。不少到過澳門的人都有一種感覺，覺得這裏有較深的文化底蘊和歷史文化氣息。的確，澳門近幾百年來形成的歷史文化，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看，雖然與她原來所屬的香山縣（即今天的中山、珠海、斗門）仍有不少淵源關係，但亦已產生了許多不同之處。澳門完全有必要作為一個獨立的地域文化區域進行研究。

地域文化研究的內容十分廣闊，理論五花八門，本文並非一篇全面論述地域文化理論的文章，亦非對澳門地域歷史文化作全面的剖析，只是希望運用一些有關研究地域文化的論理，審視澳門歷史文化發展變化的若干狀況和歷程，通過分析，一方面使我們對澳門歷史文化發展變化的主因有更清晰的認識，另一方面希望通過澳門這個特定的案例研究，對研究地域文化的論理有新的補充，從而推動地域文化研究的發展。我們當然更希望這個研究能為澳門未來文化發展的策略提供一些參考的意見和素材。

筆者認為地域文化主要由物質與非物質、制度和精神文化構成，認為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地域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力。<sup>④</sup>本文將以這種理論作為研究的框架，從三個方面探討澳門歷史文化的問題：1 澳門港崛起的自然地理因素與社會歷史因素再研究；2 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現實價值；3 澳門歷史文化形成、發展的正反啓示。在討論每一個問題的時候，我們都會以澳門歷史發展狀況作為依據，同時亦會從具體的研究中引申出一些有關地域歷史文化的理論進行探討，儘量使研究不流於僅僅是現象和過程的考證和描述。

<sup>②</sup> 黃鴻釗，《澳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120—129。

<sup>③</sup>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12—13。

<sup>④</sup> 關於地域文化構成的理論參看周振鶴主著，《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1。本文把書中的“物質文化”改為“物質和非物質文化”是為了涵蓋得更準確。

## 一、澳門港崛起的自然地理與社會歷史因素再研究

一般研究地域歷史文化的學者都會認同自然因素和社會歷史因素對地域歷史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有着決定的意義。有的則用“時”與“空”的概念去涵蓋。<sup>⑤</sup>但用相同的理論模式去研究同一問題，並不意味着研究的過程和結論的深淺程度完全一致。如當我們審視澳門港崛起的原因時，一般的學者都會用時空的概念去分析，認為在西人東漸的時代背景下，他們選擇了澳門這個空間，於是近五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一個重要平臺的歷史就開始了。如果這種研究成果的展示在澳門研究的起步階段，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時至今天，仍然停留在這種水平，隨便找幾個例子說明一下就算“研究成果”，就未免老調重彈，了無新意了。我們認為，一切學術研究都應該從事實和現象開始，只有認真從具體的研究着眼，才可能有新的發現，因為這個“具體”的選擇，往往是決定研究成果深淺的關鍵因素。

自然地理環境對地域文化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這已經是無庸置疑的理論。但如何考察澳門的地理自然條件，卻又有許多要素需要注意。

首先是澳門的地理位置。澳門處於南中國海之濱，在珠江出口西部。從微觀來看，它處於東經 $113^{\circ}31'33''$ — $113^{\circ}35'43''$ ，北緯 $22^{\circ}06'39''$ — $22^{\circ}13'06''$ 之間；<sup>⑥</sup>從宏觀看，它位於亞洲的要衝，與歐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的海上交通都可以連接。在十七世紀以後澳門成為亞洲海上運輸三大航線的中轉港充份說明了它所處地理位置的優越。<sup>⑦</sup>所以，澳門的自然地理位置無論是從微觀或是宏觀看，都成為它崛起的重要因素。

過去我們在研究地域文化時，敍述一個地區的微觀位置，很大程度是為了介紹它的氣候和物產，亦即從人類生存條件去了解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但是，用這種觀點去看澳門的自然地理條件，恐怕很難看出自然條件對澳門歷史文化發展起重要的作用。

<sup>⑤</sup> 嚴飛生，〈地域文化學的若干問題研究〉（碩士論文，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2006），11。

<sup>⑥</sup>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12。

<sup>⑦</sup> 亞洲三大運輸航線是指：1 從澳門向東北到長崎；2 從澳門往西，穿過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再到阿拉伯、地中海和歐洲、非洲；3 從澳門向東南到菲律賓，再橫過太平洋，到南美洲。

我們認為，認識澳門位於南中國海濱和珠江出海口，最重要的是不僅要看到它是一個具一般港口條件的地方，而就當時的條件來說，是非常理想的海港。廣東清初著名學者屈大均曾清楚指出：“蠔鏡在虎跳門外，去香山東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灣，海水環之。番人於二灣中聚衆築城。自是新寧之廣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門；東莞之虎門、屯門、雞棲諸澳悉廢。”<sup>⑧</sup>可見澳門港在明清之際的地位和影響。除港口本身的條件之外，我們更要看到它有兩條水道通往中國南方大港，亦是當時中國著名大港——廣州，它的崛起離不開廣州的影響。事實告訴我們，澳門港在明後期的崛起，與廣州港存在的背景不可分割，它們在這個歷史時期同時成為中國南方重要的港口，是互為條件和互相影響的結果。我們從下圖會更清楚看到，珠江出海口岸從距現在八千年前到十九世紀的變化，隨着時間的推移，廣州港與海的距離越來越遠，到了十七世紀，珠江出海口岸的現代形態基本形成。這時的廣州港已經不再是像漢唐時代那樣的天然理想港口了。但也是正在此時，卻產生了新的社會因素，澳門港利用廣州港在對外貿易方面的歷史積澱，而廣州則利用澳門作為外港，在兩地自然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的交錯作用下，一個南方海上貿易基地便迅速形成。

<sup>⑧</sup> 屈大均，《廣東新語·澳門》（北京：中華書局，198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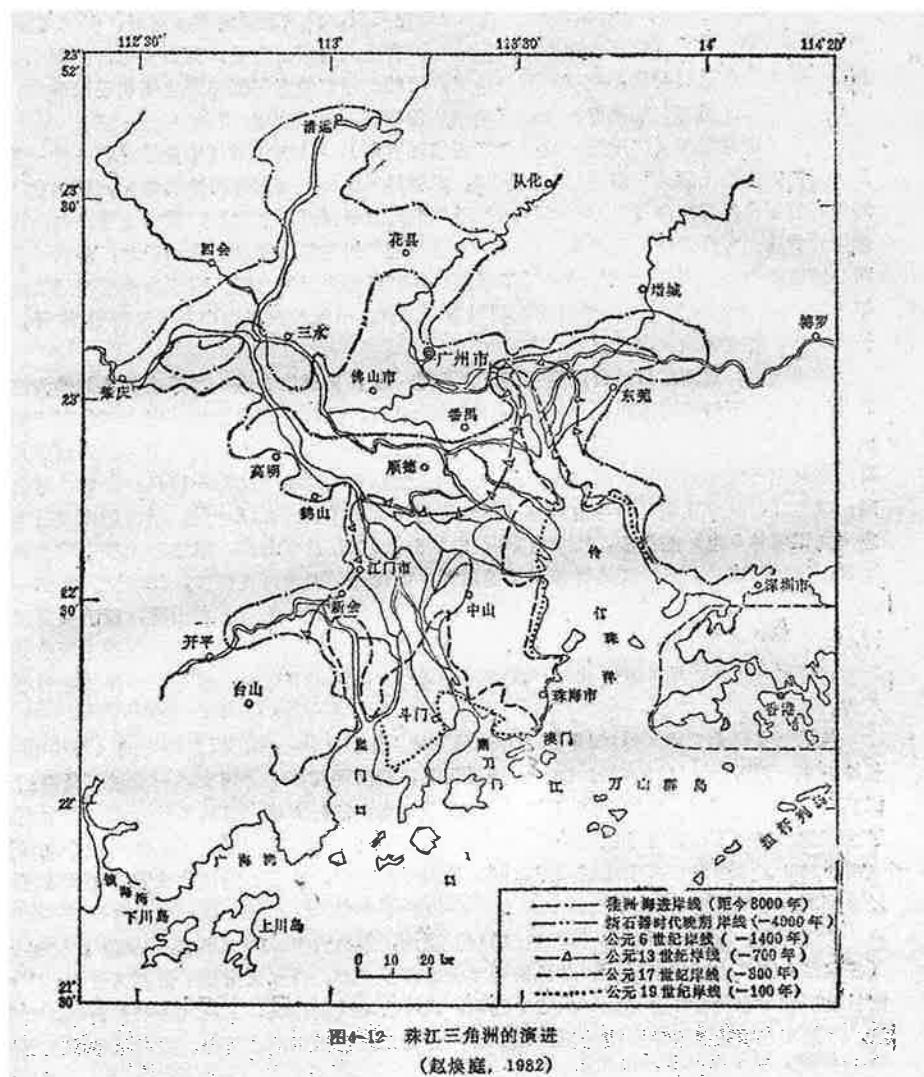


圖4-12 珠江三角洲的演進  
（趙煥庭，1982）

（資料來源：趙煥庭，《珠江河口演變》（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95。）

作為澳門自然地理條件的研究，除了上述的原因外，同時還應看到它與珠江三角洲緊緊相連的這一個因素。因為珠江三角洲地帶具備了河流水上網絡的特點，它與海港相連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自然資源。另外最特別的是珠三角在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正處於一個“生長期”，大量的沙田出現，使

珠江三角洲不斷擴大。<sup>⑨</sup>在這種自然環境下，它天然具備了吸納人口和發展經濟的潛力，同時亦意味着它具備了成為多元文化地區的條件，因為從四方八面遷來的人口，必然帶來不同的地域文化，所以，吸納新移民實際上是吸納不同的地域文化，對這個地區的文化無疑帶來新的影響。我們千萬不要輕視這種特性所帶來的社會作用，為甚麼當澳門崛起之後，香山地區首先受到影響，除了地處比鄰之外，這個地區的土地和人口處於增長狀態亦是重要的因素。澳門的運輸和商業的崛起刺激了鄰近地區的發展，也正因這些鄰近地區有發展的條件，才造就了澳門港口地位的鞏固。十八、十九世紀珠江三角洲，特別是從廣州到珠江出海口部分的河流網絡出現空前的繁榮，被一些外國人形容為“簡直是一座水上浮城”，<sup>⑩</sup>如果我們進一步深入了解和分析，就會更加清楚看到這種自然環境如何在特定的社會條件影響下，形成特別的多元文化。

另外我們認為，認識澳門的自然地理環境還必須從更寬闊的視野，即從亞洲和世界的角度去審視。

澳門地處南中國海之濱，珠江出海口，考古發現充份說明，這裏自古就是人類文化交往活躍的地方。人類通過海路傳播文化從遠古時代開始就具有特別的意義。<sup>⑪</sup>正因澳門地處亞洲海路的中心點，北上可經福建、江蘇、浙江和山東等地的海岸到日本，南可到東南亞各地，西可到穿過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在十六世紀麥哲倫開拓了美洲到呂宋（菲律賓）的航線後，澳門基本上可通過海路到世界各地。交通的重要通衢具備了作為文化薈萃之地最重要的條件。今天我們從澳門文化中非常容易找到東亞、東南亞、南亞、西歐，以至南美的文化影響，一個面積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半島和小島，混合了這麼多不同的地域文化，應說是一種不同地域文化長期交流和積累的結果。

過去，我們在談自然地理對地域文化的影響時，往往忽視了它的時間坐標。好像有甚麼自然條件就自然產生甚麼文化，這種推論的方法往往使我們

<sup>⑨</sup> 關於珠江三角洲及珠江出海口的歷史變遷，參看趙煥庭，《珠江河口演變》（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93—105。

<sup>⑩</sup> 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11。

<sup>⑪</sup> 有關澳門及環珠江口的考古文化，參看鄧聰，《古代澳門與東亞世界》，收吳志良等編，《澳門史新編》第一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1—17。

陷入了純粹的自然決定論。其實，一種地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實際是自然和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雖然，自然和社會因素，都存在可變性，但相對而言，自然的因素來得較為穩定，所以我們在分析了澳門在形成自己獨特的地域文化的自然條件之後，必須分析形成這種地域文化的時代及其他社會因素，方能對澳門地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有較清晰的認識。

由於資料上存在大量的空缺，所以我們對澳門歷史文化較為系統的研究，一般只有追索到十六世紀中葉，即澳門港崛起的年代。而這個年代同時亦是中國對外交往和貿易產生重要變化，以及西人開始東漸的年代。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所有上述這些時代的因素，都對澳門港的出現產生過重大影響，所以可以說澳門港是大時代的產物。而它的這個特性，對它後來形成的歷史文化特質，無疑有決定性的影響。

明代永樂（1403—1424年）以後，中國在對外貿易和航海活動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官方大規模的航海活動隨着鄭和下西洋的結束而基本停頓下來，而朝貢貿易亦急劇下降，外國前來與官方貿易的船隻越來越少。明朝最著名的官方“龍江造船廠”也面臨倒閉的命運。<sup>⑫</sup>這些跡象充份說明中國官方壟斷海上貿易的時代基本結束，而代替它興起的是私人海上貿易。

明朝中後期商品性農業和民營手工業的迅速發展，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尤其是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商品經濟更加活躍。但是，這種發展並沒有成為明朝經濟發展的導向，而自朱元璋定下的海禁“祖訓”，在鄭和下西洋結束之後，又變成了官方執行政策的主流。於是我們看到，一方面是商品經濟的興起，另一方面是朝廷政策的嚴厲約束。“沿海軍民，私與賊市，其鄰舍不舉者連坐。”<sup>⑬</sup>這種社會矛盾就是明中後期“海患”的重要根源。正如林仁川在《明末清初海上貿易》中指出，明代出現的“倭寇”和“海盜”，實際很多是一些海上私商集團。這些海商集團，除了在中國沿海活動，還在東亞、東南亞、南亞以至歐洲和非洲活動。<sup>⑭</sup>既然在中國東南沿海有如此活躍的私商集團，而西方也剛巧處在開拓世界航道和重商主義冒起

<sup>⑫</sup>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前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1—2。

<sup>⑬</sup>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明世宗實錄》卷一五四，3488—3489。

<sup>⑭</sup> 參看《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第三、四、五章，85—214。

的年代，私人的海上活動成為一股東西呼應的潮流。私人貿易港口的興起勢在必然。所以，從歷史發展的宏觀角度看，明代中葉以後中國東南沿海私人貿易港口的出現，是一種順乎歷史潮流的事，也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sup>⑯</sup>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看當年澳門港的崛起，就不會覺得奇怪了。

歷史非常清楚顯示，澳門在葡萄牙人1557年上岸入據以前，就已經是一個海上貿易點。<sup>⑰</sup>這裏有天然良好的海灣供海船停泊，所以澳門港在開港以後，迅速成為繁盛的對外貿易港。<sup>⑱</sup>大批中外商人聚集其中。除了中國人，葡萄牙人之外，還有日本人、馬來人、印度人、暹羅人和非洲黑人等，於是我們看到一群不同民族和種族的人同時在澳門出現。他們部分的自然結合產生了新的後代，這就是我們今天仍然看到的“土生葡人”（Mestizos）族群。不同民族與種族的人口結合、融和意味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常規道理，已不用作多餘的解釋。

當我們分別分析了澳門港的崛起的自然和社會因素後，似乎已經基本完成了澳門地域文化產生基本原因的分析。因為我們已從澳門近現代地域文化形成的源頭作歷史的考察，說明影響它的自然和社會兩大重要因素。不過本文認為還有一點必須強調的，就是一種地域文化的產生和發展，自然條件往往要在適當的社會條件刺激下，才能產生作用。這一點要給予充份的重視。正如我們在上文提出澳門所具有的亞洲海港和與珠三角相連的自然條件，是要在明代私人貿易勃興，西人開始東漸的歷史背景刺激下才迅速崛起的。我們不妨用“沉睡”來形容自然條件的存在狀況，用“喚醒”來比喩社會因素

<sup>⑯</sup> 明中葉以後中國東南沿海出現大量的私人貿易港，如雙嶼港、月港、安平港、梅嶺港、南澳港和澳門港等，參看《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131—175。

<sup>⑰</sup> 雖然萬曆三十年郭棐寫的《廣東通志》所說葡萄牙人在嘉靖三十二（1553）年入居澳門之說已被當代學者考證有誤，但他所記述的有關葡萄牙人入據澳門時的社會狀況和過程，仍值得參考。“時僅蓬壘數十間，後工商牟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矣。”（見該書卷六九，〈番夷〉，萬曆三十年刻本）。而文中提及的所謂“蓬壘”，就是指來貿易的外國商人在澳門半島上特許搭的臨時房屋，當貿易完成離去即要拆除。可見澳門在葡萄牙人1557年入據前，已有來貿易的商人的臨時住所，是沿海一個貿易點。至於葡萄牙人正式入據的年代，參看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77—92。

<sup>⑱</sup> 據龍思泰的《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校註本，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記述，即使是到了19世紀初，澳門的航道，仍然可以通過300—400噸滿載貨物的船隻。參看該書34頁。

對自然條件的刺激作用。一種地域文化的形成往往就是地域的自然條件被某些社會因素刺激的綜合結果。我們認為認識這種論理，不僅對於分析地域文化的產生、變化很重要，而且對掌握該地域文化的特質有決定性的影響。

## 二、澳門地域歷史文化研究的現實價值

目前世界文化正走向一個融合的時代，科技的發展大大打破地區、國家、民族之間的隔閡，為文化的融會創造有利的條件。但正如不少學者指出，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時代，繼承和發展地域文化有其特殊的意義。如果世界文化的融合只是一種超級大國文化的延伸和對弱小國家和民族文化的“吞併”，那世界文化的融合必然是一場人類文化的大倒退。基於這種理念，本文試圖從三方面看澳門地域歷史文化研究的價值。

第一，從文化積累和發展的角度看，地域文化研究具有非常正面的推動作用，所以在澳門，地域文化的系統研究應提到重要日程上來。

正如本文在開始時就指出，近十多年澳門研究有長足的發展，其中包括歷史文化方面的研究，亦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從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研究的面已經鋪得很廣，涉及宗教、教育、文藝、社團、語言、旅遊、飲食以至博彩等領域，研究資料的積累亦相當可觀。<sup>⑩</sup>應該特別提出的是，通過“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傳統文化傳播”等層面的專題研究，澳門研究的確得到深化。不過我們仍然感到，具有強烈地域文化色彩和豐富文化積澱的澳門歷史文化未被作整體性的研究和發掘。從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角度，即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系統整理和研究澳門歷史文化，應成為目前深化澳門研究的重要和具可行性的戰略目標。

澳門回歸十年，各方面的成就舉世皆知，但澳門未來的發展方向，卻是熱愛和關心澳門的人心目中的一個疑團。因為雖然澳門近十年經濟發展非常迅猛，但是博彩業的發展與其他事業發展的比例使人們不得不感到憂慮。說實在，澳門可利用來進一步發展經濟的自然資源不算豐富，但社會文化資

<sup>⑩</sup> 近年以專著和學術論文形式發表的有關澳門歷史文化的成果太多，已出版的大型中外歷史文獻資料集亦不少，恕不一一列舉。不過筆者對澳門基金會在推動歷史及歷史文化資料整理和研究方面的貢獻，借此表示由衷的敬意。

源，特別是歷史文化資源卻是一份“天賜”的不可多得的社會財寶。我們當然不可誇大對澳門歷史文化作系統研究的作用，但如果我們能從歷史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發展狀況，從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轉化的過程去認識澳門文化的特質，這對我們尋找澳門未來發展的路向肯定會有啓發和幫助。比如說，現在的世人都愛談“文化產業”，澳門也會有不少有關文化產業的研討會在這裏舉行，澳門的文化產業未來有了方向嗎？好像仍未有較為肯定的答案。筆者認為，這些討論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對澳門的歷史文化本身的認識不深。不要以為澳門有入世界文化遺產的舊城區，就標誌着澳門可以永遠吃不完的歷史文化老本。歷史留給我們這些寶貴財富僅用作旅遊業的招徠，恐怕是太可惜了。如果我們能夠認真深入研究，發掘澳門歷史城區發展過程以及對澳門的歷史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影響，我們便可以大大充實和增加對歷史城區的文化含量的認識，從而挖掘出新的文化能量，由此而考慮我們的文化產業的發展，相信定能提出一些有新意、有吸引力的文化產業的設想。我們應非常清楚知道，地域文化研究提出以三種文化為研究主要對象，並不是主張對三種文化進行分割式的研究，而是既需要對每種文化的內涵進行深入探討，與此同時，還要研究它們之間互動規律。“精神文化”在一定的條件下會轉變為“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利用深度認識歷史文化的知識去發展文化產業，從實質上看，就是這種轉化過程。在澳門未來發展的路向方面，利用澳門歷史文化毫無疑問是不可忽視的一環，所以在目前經濟非常良好的社會條件下，集中一定的人力和財力對澳門地域歷史文化進行系統的整理和研究，一方面加深澳門的文化積累，另一方面又為澳門社會的未來發展開拓資源，無論從哪一角度看，都具有效的社會價值。

第二，在近幾百年澳門地域文化發展過程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澳門制度文化對歷史文化產生的影響，以及在一種在雙重管理的模式下，完成它文化融合的歷史發展進程。

當大家都用“近幾百年中西文交流的窗口（或橋樑）”去形容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歷史的重要地位時，我們是否想過如何維持這個窗口（或橋梁）管理模式的作用？本文在這裏並不打算展開討論澳門近幾百年管理模式的變遷，只需引用一些大家較為認同的觀點便可以說明澳門歷史上的管理模式確

實存在特殊性和對現實存在啟發性。

澳門在1557葡萄牙人入據澳門後到1849年，葡萄牙人是用交租的形式取得居留權，澳門在行政上原則是受中國政府控制和管理的，中國政府在澳門城區內設有管理機構就是最好的說明。但是，澳門的葡萄牙人在一定的範圍內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自治管治機構，形成澳門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存在雙層管理機制。澳門特殊的中西混合的文化觀景，正是在這種特殊制度的影響下形成的。但我們必須看到，在這個歷史階段葡萄牙人的自治管理機構，是在中國王朝的監控下運作的；葡萄牙人也並非“雙重效忠”，這一點從澳門的議事會最早自發產生到後來聽命於印度的果阿，再到由葡萄牙的里斯本直接管理的過程便可得到充份的證明。<sup>⑨</sup>在1887年以後，葡萄牙人通過《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佔領了澳門，取得了管治權，無疑使中國管治的權力受到壓制，而擴大了葡萄牙人的管治權力。從文化的角度看，西方文化得到了更大發展的可能性。不過，這個時候的葡萄牙人，已並不是一個世界上的強者，他們沒有能力用佔領者的強勢打造一個新澳門，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澳門華商的經濟迅速冒起，而澳葡政府實行的經濟政策基本失敗，所以澳門基本上維持原有的文化模式：中西並存，各自發展，而較大的改變只是西方文化發展在政府的正面支持下得到強化。所以從文化發展的總體特徵來說，澳門從1887年到1999年回歸中國，只是1557到1849年文化發展一個歷史的新延續。

同一個管理區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的管理機構存在，這裏的百姓基本上可以各自按照自己傳統的文化方式生活，西方人去教堂做彌撒，中國人去廟上香；葡人基本講葡語，中國人基本講中文，當然還有既會葡文又會中文的中葡混血兒。兩種不同種族文化長期以基本和平的方式共存的現象在世界上是為數不多的，因而是一個重要的案例，說明文化的傳遞、流播可以在不同政治體制獲得相對平衡與和平的狀態下進行。我們認為，早期的西方殖民者，不象中後期的殖民者一樣，“用劍與火的文字，寫在人類文明的編年史上”，實行強制性的文化政策，首先推行宗主國的言語，然後

<sup>⑨</sup> 黃鴻釗，《澳門史》，120—129。

實施各類磨滅地方文化的政策，而是在文化政策上具一定的寬容度。<sup>②</sup>當然，澳門的案例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明清政府對澳門堅持管治。由於澳門的中國人仍然受到朝廷的保護，他們在生活模式和思想信仰方面維持和傾向中國傳統文化。由此可見，澳門的中國傳統文化和葡萄牙以及外來文化能同時存在和互相共融的最重要條件，是澳門近幾百年來並不存在一種強制性的文化政策。

由於澳門是一個商業港口，因此人口流動性較大。這種流動性為不同的文化，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葡萄牙以及外來文化在澳門的延續影響奠定了基礎。很多澳門的葡萄牙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回里斯本接受教育，等他們念完書才回澳門工作，而澳門華人的教育亦與內地同步前進，這種教育體制和模式的特別之處就是，使兩種最重要的文化都不會被對方“同化”，而只是共存、互相吸收。因而澳門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有相當的優勢，這就是交流的穩定性和延續性。

雖然我們在本文不可能把近數百年在澳門的中外文化交流作深入的剖析，這是一個非常複雜而耐人尋味的課題。但筆者仍然願意提出一些觀點，以引起學屆的討論。比如，澳門的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近數百年制度文化有關係；在特殊模式下的澳門中外文化交流有甚麼特色？澳門當代社會具有較大的包容性和兼容性，社會和諧的氣氛比較濃，這與澳門在長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地域文化有甚麼關係？等等。

有些學者認為，目前美國在世界文化中正推行“普世主義”，他們想把世界文化美國化。<sup>③</sup>這種觀點雖然看到美國在世界文化上推行的霸權主義，但實際上卻是過高估計美國在世界文化上的影響力。世界文化交往的歷史已為我們提供了不少富有意義的案例，為不同國家、種族、地域文化的和平交融提供了有益的借鑑，我們為甚麼不會從這些借鑑中吸取有益的養分？而澳門近幾百年基本和平進行文化交往的經驗應是一個有價值的例子。我們看到，一方面是西方殖民主義的興起和東進，另一方面是中國強大的傳統文化在這裏的延續，兩種文化和文明在澳門相遇，他並不像同時期其他地區那

<sup>②</sup> 早年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統治近三百年，但是在語言方面並沒有同化，是另一個例子。

<sup>③</sup> 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368。

樣，伴隨着嚴重的衝突，而是基本以和平的方式進行，這實在應該視為是人類一種文化交流史上的特例，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尤其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時代，具有重要的啓迪意義。

### 三、澳門歷史文化形成、發展過程的正反啓示

我們在上文提及澳門歷史文化形成和發展的經驗在當代具有特別價值，並非說澳門歷史文化形成和發展完全是正面的。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有它的價值，亦必然有它的不足。有時正反經驗是互相依存，互為存在條件的。所以我們不可以只看到事物的價值而忽視它存在的問題，也不應因為它存在問題而全盤否定它存在的價值。

因為在上文談及澳門歷史文化的當代價值時，已重點指出了它的正面經驗，現在我們將從反面看澳門歷史文化的經驗，提出若干目前澳門文化中存在和值得思考的問題，希望能從這些問題開始，進入歷史的思考，進一步總結澳門歷史文化方面的經驗。

1、澳門歷史文化有豐厚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的積澱（如歷史城區、風俗習慣），但卻較缺乏精神文化的積澱。至今為止，我們仍然很難概括澳門精神文化的特質。除了上文提及的澳門人的兼容性和包容性的特質外，還有甚麼其他精神文化上的特質呢？我們特別感到，現代澳門的文化機制未能隨着經濟的發展而加強。社會對歷史文化的利用多是急功近利，追求經濟上的效益為前提，缺乏人文思想。

2、至今為止，澳門的中外文化兩個文化圈的共存較好，但兩個文化圈相交部分的成果未如理想。在利用中外文化交流平臺時，沒有有意從行政上創造更多的機會，促進兩者的繼續融合。中外文化交流仍然處於“自然生長狀態”。

3、地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需要形成當地人的歸宿感。澳門在歷史上人口流動非常頻密，一方面為澳門多元文化的形成帶來正面的推動力，但流動的人口是文化歸宿感不強的一群，他們“過客”、“暫住”的思想給澳門歷史文化經驗的提升和延續帶來一定的障礙。西方殖民地時代留給管治地區的“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地方”的問題，澳門同樣存在，我們在發展當代

澳門文化時，有沒有充份考慮到這方面的影響呢？

從文化研究到文化實踐再到文化發展當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筆者願意與大家一道，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精神為澳門的文化建設添磚加瓦。

(鄭德華 澳門 澳門大學中文系 )